

□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作为钧瓷界知名的大师,一直以来,苗长强以《长城鼎》《小口尊》《祥尊》《双龙瓶》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品,展示着其在钧瓷艺术上的执着追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苗家钧窑的掌门人,苗长强深受父亲苗锦坤的影响,在钧瓷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弘扬上不断探索。

为人诚恳的苗长强并不善于言辞,但在面对钧窑历史和钧瓷艺术发展的问题时,他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近日,苗长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关于钧瓷

“始于唐、盛于宋”的思考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这在钧瓷界是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语。从中国陶瓷史上看,钧瓷窑口的根脉可以追溯到唐代。但要真正弄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钧瓷的发展历史往上追溯。苗长强认为,弄清楚唐钧花瓷与后来钧瓷的关系,就能比较清晰地理解为什么说钧瓷“始于唐”。

“唐黑釉蓝斑器”,也叫唐黑釉花瓷,在唐代,山西交城、陕西耀州、禹州神垵下白峪、禹州苌庄、鲁山段店等地都生产这种瓷种。在禹州,这种花瓷已成为当地主要瓷种之一,苌庄、神垵等主要瓷区都大量生产。20世纪50年代以来,禹州市曾多次出土黑釉花瓷的完整器物。自从1977年冬在神垵下白峪发现唐黑釉花瓷至今,父亲和我对黑釉花瓷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他把从下白峪窑址得到的瓷片标本送到故宫博物院,经权威专家鉴定确认烧制年代为唐代。2005年,山东省硅酸盐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凯民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测试和分析,充分论证了唐代花瓷釉与宋元钧窑系釉等分相乳光釉的源流传承关系。我们的论文《唐钧花瓷的本质及其与后世分相乳光釉的关系》被收入《中国禹州钧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后又发表于《山东陶瓷》2006年第一期。”苗长强说。

在苗长强看来,这种黑釉花瓷造型古朴,釉色凝重豪放,别具特色。在黑釉上泼着大块的乳光蓝斑或白斑纹,黑釉花瓷上的窑斑乳光莹润,淋漓酣畅,变幻莫测,对后世分相乳光釉的产生意义重大。继唐钧之后,在同一窑区陆续烧制成功的柴窑、钧窑、汝窑的“雨过天青”等一系列分相乳光釉,都是在其启示下发展演变出来的创新釉种。

钧窑烧制技艺在传承中发展

“陶瓷制品的烧成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过程。物理变化主要

溯源钧瓷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苗长强谈钧窑及钧瓷艺术发展



苗长强近照 苗长强钧瓷作品《鸡心尊》



有干燥收缩、烧成收缩、自有水的排出、颜色的变化;化学变化比较复杂,烧成过程中不但坯釉原料相互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复杂的硅酸盐和铝硅酸盐,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气体也参加了陶瓷制品的化学反应。化学反应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氧化还原反应,那么就有了钧瓷上所讲的氧化焰和还原焰。”苗长强说。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苗长强对钧瓷釉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钧窑自恢复烧制以来,仿天青、月白釉者很多,和紫红钧釉相比,其难度较大,故烧天青、月白釉多是加入着色剂,所以在不加着色剂的情况下烧成仿柴之‘雨过天青’实在不易。随着科技的进步,钧釉中的化学成分特别是微量元素的含量都能精准分析。研究表明,钧釉中的天青、月白釉是在还原气氛下自然形成的。所以钧瓷产量由起初的人为在釉中加入着色剂以氧化焰烧成大火蓝,到后来以天然矿物原料还原焰烧成天青、月白釉,属于借鉴钧窑创新发展的一种突破。”苗长强说。

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创新。如今,钧釉的调制更趋容易,烧成的钧釉玉质感更强,开片更有趣,结晶倾向更强、微观结构更离奇。另外,钧窑所用的窑炉及燃料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钧

窑烧成采用了抽屜式窑炉,燃料新增液化气和天然气为燃料,比柴和煤更容易控制窑炉气氛和温度,窑工劳动强度降低,烧成过程一气呵成,不再像柴烧和煤烧有非常复杂的烧成气氛变化。

“钧窑在每个发展时期都有着自已的特点,由于追求不一样,自然产生了不同的风格。钧窑的器型和釉色发展到今天,说令人眼花缭乱并不夸张。但在纷繁复杂之中,我们应该把握一条主线,天青、月白、红、紫这些基本釉色我们不能丢弃。不管钧瓷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将钧瓷的特质传承下去。”苗长强说,在当代艺术品市场存在大量的瓷种和名窑,它们体现着不同的设计理念和艺术风格。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审美和用途不同,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作品。“钧瓷人”应该始终坚持自身特色。钧瓷之美,美在器型,更美在釉色。一件作品的造型一定要体现出釉色之美,要提供一定的釉面来展现釉色。因此,钧瓷的造型一定要繁简有度。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光环的背后,凝聚着苗长强数十年对钧瓷艺术的不懈探索。

窑烧制带来了质的飞跃。以液化气和天然气为燃料,比柴和煤更容易控制窑炉气氛和温度,窑工劳动强度降低,烧成过程一气呵成,不再像柴烧和煤烧有非常复杂的烧成气氛变化。

钧官窑之谜的破解和钧瓷艺术的发展

位于禹州市老城区的宋代钧窑遗址,曾是北宋时为皇室烧制钧瓷贡器的官办大型窑场。该窑场内所烧制的钧瓷器皿,无论是从釉色还是造型看,都代表着钧瓷发展于鼎盛时期的最高工艺水平。“对钧官窑址的研究表明,钧窑的窑变效果与本地原料的性质及微量元素、地理环境都有一定关系,必须遵从严格的制作工序。1973年钧官窑遗址发掘时发现钧官窑遗址里的釉土是经过由高及低3次澄滤后才投入使用的,泥料的使用也需要经过严格澄滤。同一矿区的泥料处于不同矿层,也会对釉质产生一定的影响,必要时须在釉料中加入熔块。”苗长强说。

1973年对宋钧官窑遗址中的一处制瓷作坊残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清理出了疑似澄滤后的钧瓷釉料土层。对该土料进行化学分析的结果显示,受检土料中含氧化硅72.2%、氧化铝12.39%。这个结果说明,这

些土料成分符合钧瓷釉料高硅低铝的基本要求。山东省硅酸盐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凯民对这些土料进行了化验分析,发现该土料含氧化硅77.2%、氧化铝9.07%。两地化验结果虽然在氧化铝含量上略有差异,但在高硅低铝的认定上是一致的。据此可以初步肯定这些土料就是宋钧窑当年使用而遗留下来的釉原料,而且是通过淘洗澄滤沉淀等工序之后的纯净釉料。依据这批出土釉料成分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试烧,钧瓷界最终成功烧制出了堪与宋官窑器皿釉色相媲美的天青釉、月白釉和玫瑰紫釉。

“北宋时期,陶瓷匠师在唐代花瓷技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把含铜元素的原料加入釉内经高温还原烧制,钧瓷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可以说以铜为着色剂加入釉中是‘窑中注定’。”苗长强说。

在苗长强看来,钧瓷的珍贵之处,首先是好的窑变釉色,其次则是造型。自钧窑恢复烧制以来的百余年间,钧窑匠师在钧窑研究方向上,以宋钧官窑釉为典范进行模仿,并用现代化手段测试出釉中的化学成分,但宋代匠师配制釉料究竟用的什么原料,均处于猜测之中。

“原料对钧瓷制品的影响不可忽视。组成陶瓷釉的主要元素不外乎硅、铝、钾、钠、钙、镁、钛等,钧釉也不例外。钧釉的主要成分能够形成玻璃体的硅酸盐。不同的是,钧釉在烧制过程中会产生‘液-液分相’作用,形成乳光莹润的艺术效果。只要釉中的硅、铝比例及磷含量适度,烧成气氛合适,就能形成乳光分相现象。”苗长强说。

“钧瓷在每个发展时期都有着自已的特点,由于追求不一样,自然产生了不同的风格。钧窑的器型和釉色发展到今天,说令人眼花缭乱并不夸张。但在纷繁复杂之中,我们应该把握一条主线,天青、月白、红、紫这些基本釉色我们不能丢弃。不管钧瓷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将钧瓷的特质传承下去。”苗长强说,在当代艺术品市场存在大量的瓷种和名窑,它们体现着不同的设计理念和艺术风格。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审美和用途不同,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作品。“钧瓷人”应该始终坚持自身特色。钧瓷之美,美在器型,更美在釉色。一件作品的造型一定要体现出釉色之美,要提供一定的釉面来展现釉色。因此,钧瓷的造型一定要繁简有度。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光环的背后,凝聚着苗长强数十年对钧瓷艺术的不懈探索。

挖掘许昌古琴文化资源 精心打造中原魅力古都

□林蔚

为进一步弘扬古琴文化,展现古都许昌古琴文化历史,把古琴文化打造成许昌的亮丽文化名片,由许昌市人民政府、中国乐器协会主办,许昌市委宣传部、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北京乐器学会、中国乐器协会器乐文化专业委员会、天津城建大学中国古琴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暨全国名坊琴展于4月8日在许昌举行。

近年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已被广泛重视,但“如何做”需要统筹谋划并推进。如果能够以考证古都许昌为古琴曲的重要发源地为契机,把握许昌与古琴文化的独特之处,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打造许昌文化名片,许昌一定能够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大放异彩。

一、挖掘许昌文化内涵,深度表述地方特色

古琴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弹拨乐器之一,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琴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春秋战国之后,古琴日渐成为中国人最高的审美情趣之一。

在古琴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占有重要地位。古琴文化同河南多地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殷商故都安阳哺育了古琴文化的源头;以开封为中心的北宋琴画至今仍享誉世界,让人回想起昔日汴梁的繁华;古琴文化史上最有名的焦尾琴是用上好的泡桐所制,而河南兰考以泡桐木制琴驰名中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民乐之乡”。

在古琴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许昌同古琴,尤其是古琴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存最早的古琴曲《通世操》,就是由尧舜时期隐居许昌的名士许由所作,许昌至今仍存有许由挂瓢处、许由冢等历史遗迹留存。不仅如此,目前广为流传的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广陵散》也与许昌有着深厚的渊源。《广陵散》又名《聂政刺韩王》,描述的是战国时铸剑工匠之子聂政刺杀韩王,为父报仇的悲壮史实。春秋时期韩国的故都阳翟,就是现在的禹州,目前禹州仍有聂政台留存。

许昌是三国时期魏都所在地,汉魏时期是古琴发展的高峰时期,现存古琴名曲与三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联通的有50多首,足见许昌在古琴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因此,挖掘许昌古琴文化资源,深度表述许昌古琴文化在音乐学、历史学等意义上的人文性,有利于奠定许昌古琴文化在历史传承方面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

二、讲好古琴文化故事,打造许昌文化名片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是一个地方核心竞争力和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和开发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是提升一个地方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举措。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和文化传播影响力,将为推动许昌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要真正挖掘古琴起源和器物留存、曲谱传承以及斫琴技艺与许昌的深刻关系,使许昌真正抓住古琴渊源、古琴曲发源地和斫琴工艺的重要传承地的优势,突出地方特色,讲好许昌古琴文化故事,以文化自信来打造许昌文化名片。继三国文化、钧瓷文化之后,相信古琴文化会成为新的许昌标签和名片,助力许昌成为中原名城、中国名城乃至世界名城。

三、实施高质量挖掘和开发,匹配古琴之世界文化遗产定位

2003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古琴艺术与世界其他27种艺术形式一同获此殊荣。近年来,古琴艺术源远流长方面亟需大量的文献整理和文字沉淀工作。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许昌古琴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古琴与中原尤其是许昌的紧密联系,亟须出版一大批厚重的学术著作,推动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定位,与世界文化遗产定位相匹配。

要深度挖掘古琴与河南在历史和现今的强大关联,为将古琴文化打造成中原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助力新型城镇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实物支撑和理论支持。

四、彰显古都文化特点,建设古琴文化特色小镇

河南的特色文化小镇建设水准一直位于全国前列,以兰考的固阳小镇为例,就规划形成了以笛、箫、琴等乐器为中心,集制造、表演、观赏等为一体的多维度乐器文化小镇。许昌也有文化小镇,如以钧瓷文化为主题的神垵小镇,但是以古琴文化为主题的小镇尚未规划并打造。如果许昌能够建立以古琴曲源流和古琴名曲为中心的古琴文化小镇,打造涵盖古琴历史、古琴制作、古琴表演、古琴文化普及和传播为一体的特色小镇,不仅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激发爱国热情,而且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真正使古琴文化成为助力许昌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小觑的力量。

古琴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都许昌极具潜质的文化名片之一。弘扬一地之文化,必须突出一地之特点。许昌作为曹魏古都,其特点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但尚有以古琴及古琴曲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文化资源亟待开发。这是历史留给许昌的宝贵财富,也是时代赋予许昌人民的宝贵机遇。(作者为许昌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

我市首个省级 单项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正式揭牌

本报讯(记者 寇旭静)近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2019—2022年河南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名单公布,许昌实验小学游泳中心成为第一批被省体育局命名的省级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标志着我市游泳竞技项目训练管理更加标准化。

近年来,我市体育事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体育苗子,在各项比赛中屡创佳绩;在2016年河南省青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上,我市游泳健儿取得一金一银;在2017年河南省青少年儿童游泳冠军赛上,我市游泳健儿斩获一金二银。此次许昌实验小学游泳中心被省体育局命名为省级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体现了省体育局对我市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为我市青少年体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袁海东介绍,此次被命名为省级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近日,许昌第十三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健身气功五禽戏展演活动举行,吸引了1000余名健身气功五禽戏爱好者积极参与。据了解,健身气功五禽戏在我市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已成为我市全民健身活动的一大亮点。寇旭静摄



为什么要为大师建档立传

□李争鸣

地处伏牛山余脉,群峰环抱的神垵,终年熙熙攘攘,流光溢彩,被誉为中国唯一“活着的古镇”。

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镇为什么一直活力无限、魅力无穷?是因为五彩斑斓的钧瓷不断散发出迷人而夺目的光彩?是因为窑口出产的钧瓷彻夜不绝于耳的开片声?还是因为川流不息的钧瓷朝圣者神驰不已的赞叹声?

在我心中,古老的神垵生生不息且愈发美丽多姿的嬗变,实际上就是一代又一代生于斯、长于斯的“钧瓷人”用创造不断书写历史,用智慧延续辉煌的奋斗史。

这是因为,再宏大的历史,也是由一个个体而真实的“人”组成的。在每一位钧瓷艺人身上,不仅传承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历史传统,也在其殚精竭虑的劳作中,在千年不熄的窑火中,映射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钧瓷被主流学者誉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以魅力独特、个性十足的窑变之美独步瓷林,开创了钧瓷窑变万彩幻化的审美范式。但与共同生长在同一年代的汝瓷、官瓷、定瓷不同,钧瓷记载最早的文献始于明代,致使不少专家学者对其创烧的年代莫衷一是,衍生出宋代说、金代说,甚至明代说。

钧瓷的历史尚且如此,有关大师们的描述晚得更多。由于钧瓷的手工艺特点,加之正史文献对民间艺人的忽略,有关他们的记述基本处于不详不彰的状态,有史可查的钧瓷艺人,寥寥晨星。直至清光绪年间,有代表性的钧瓷艺人方在地方志书中

有只言片语,但大多数钧瓷艺人的贡献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大师资料的缺失,使我们探索钧瓷历史的发展脉络、考究器物造型的变革、梳理钧瓷艺术的历史传承,常常陷入难溯其源、难究其理的困顿。

改革开放后,钧瓷步入传承、发展、繁荣期。有关钧瓷的图书逐年增多,记录大师的文字日渐充盈,对钧瓷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山一般厚重的大师们终日忙于劳作,并不善于推广和营销自己;一些文化工作者碍于各种原因,很难长期深入其中,系统而全方位地探究和解读大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全貌。

于是,记录好大师们的从艺历程,站在艺术大观、人文关怀的角度,将大师作为一个整体集中展示,让喜爱钧瓷的藏友便捷地了解他们成长的足迹,该熟悉和把握他们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同时为更多研究钧瓷史的学者提供新的素材和路径,从而让钧瓷艺术在陶瓷之国的星空中闪耀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是我主编这部书的动力。

书名《中国钧瓷人物档案》,旨在为钧瓷大师们建档立传。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目前钧瓷界有各类资质的大师数百人,“家家有荆山之玉,人人握灵蛇之珠”,各有独特的看家本领,该以什么作为选取标准?二是自清末以来,有记载且去世的大师就有数十位,又该如何取舍?

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本书选取了50位在世大师和6位过世大师。这些大师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有窑口,且建窑时间较长;二是有称号,属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或陶瓷艺术大师;三是有特点,其作品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美誉度,基本形成了一定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钧瓷

发展高度;四是有影响,在不同的媒体有过介绍或获取过较有影响力的大奖,能够代表神垵窑区整体形象。

应该说,本书所述大体是当代钧瓷艺术的一个缩影,他们的作品和艺术成就,基本体现了当代钧瓷发展的高度。当然,还有一些符合上述标准的大师因各种原因未能入选,确有遗憾。

这部书是我曾工作过的许昌日报社各位同事共同创作的结晶。孙学涛、毛志刚先生承担了主要书稿的基础写作工作,王增阳先生承担了部分篇章的采写工作,吕超峰、耿亚伟先生提供了精彩图片,王利辉先生通读书稿后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馆长吕章申先生不吝墨宝,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景德镇陶瓷大学校长宁钢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许昌市政协副主席苏建涛先生、许昌市钧瓷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裴红庆先生、副主任张金伟先生,河南大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丰硕先生对本书的创意及装帧设计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河南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清臣先生的鼎力支持。胡先生作为一位成功企业家,对钧瓷艺术情有独钟,为配合本书出版,专门建立了中国钧瓷人物档案馆。书中所有藏品,将在该馆长久珍藏。在此,一并致谢!

毋庸讳言,集中采写众多人物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加之深入不够、时间仓促,难免存在表述不够严谨、艺术特色概括不全,甚至与事实有出入等问题。只能暂付阙如,期待再版时补正。

(本文为《中国钧瓷人物档案》后记,该书已由海燕出版社出版)